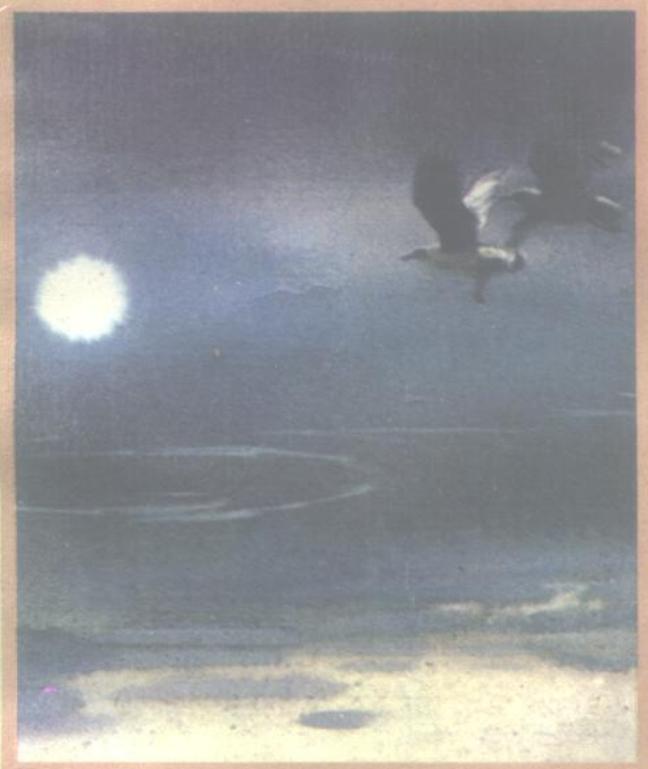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编 范和积

海南文史資料

南海出版公司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编 福和积

海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南海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海口

琼新登字 01 号

EA63/43

海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编著者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编 符和积

责任编辑 张树方

特约编辑 龙建武 [] 吴陆荣 王国建

校 对 龙建武 王国建

封面设计 姚 文

封面题字 吴陆荣

封面绘画 吴地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通什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375 印张 153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442—0239—9 / K · 30

定 价：4.50 元

目 录

抗 日 史 踪

- 南京陆军步兵学校创建者王俊将军纪实 陈一匡 (2)
怎样破击日三十八师团
——王俊将军纵谈粤北战役 炎 川 (14)
我入黄埔军校前后的回忆 周学而 (19)
保国抗战 血洒沙场
——唐惠治将军纪略 唐惠济 (32)
回忆抗日时期的硇洲琼崖难童学校 林 彬 (37)

黎 明 前 夕

- 林廷华张光琼联名起义的经过 钟慧娱 (46)
海府地区黎明前的点点滴滴
——一个中学生的周记和日记摘录 梁鸿志 (62)
黎苗同胞喜迎渡海大军 崔懋峰 (94)
海南人民迎接渡海大军作战的支前劳军
活动 邢益森 (101)

建国后史料

- 忆刘少奇主席访问大路公社 潘干 (108)
建国后的海南高校体育事业 伍建瑶 (113)
剿肃匪特巩固人民政权 杜昌圣 (120)

人物纪事

- 梨园沧桑 今昔荣辱 陈华 (134)
传奇式悲剧人物
——近代黎族头人王昭夷生平活动 ... 符和积 (150)
苗族卢亚五其人其事 朱开宁 庞玲 林友侨 (166)
卓浩然先生传略 林壮标 (174)
陈光羲其人其事 陈子平 (179)

赤子沧桑

- 陈平与新加坡的《琼潮报》 潘干 (184)
首部南来的新中国影片 王振春 (190)
五十年代的“共产鸡” 王振春 (195)

其他

- 海南西医之传入和发展 林诗泉 林书勇 (204)
基督教在海南的历史与现状 符国华 李向耘 (213)
大革命时期的琼崖农民运动 叶振群 (219)

抗
日
史
蹟

南京陆军步兵学校 创建者王俊将军纪实

陈一匡

—

王俊，原名钦宠，号荣初，字达天，生于1893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海南省澄迈县文儒乡排坡园村人。先世业农，耕读传家，父培栽，曾任广东开建县教谕、钦州学正、英德县儒学正堂，充任刘永福军幕僚。俊有昆仲五人；长兄钦寅为琼崖首届留美学生；次兄钦宣，例贡生，青少年游学南洋，不仕而卒；三兄钦安，广东法政大学毕业，曾任琼崖守备司令部上校参议；幼弟王毅（钦隽）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黄埔军校第二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历任教职、军职，曾任琼崖守备司令陆军中将兼九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战胜利后任六十四军中副军长驻琼崖，并亲笔撰写《琼崖抗战纪》。俊居第四，少怀大志，年17，弃笔从军，矢志参加国民革命。初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去北京考入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旋考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入陆军大学。毕业返国后回广东，任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兵工筑城学教官。1924—1925年间，中山先生在广

州发动东征讨伐陈炯明时，俊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团附、第三营营长，屡建战功，棉湖一役，身先士卒，战功尤著。1926年北伐时，俊任国民革命军第一旅参谋长、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副师长、师长及东路军中将总指挥官，后任浙东警备司令，广东潮梅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前，1930年奉命筹备陆军步兵学校，任筹备主任，1932年步校建成，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将校长。抗战军兴，俊于武汉任抗战大本营第一部副部长。1938年，日军侵略华南，奉命调充广东曲江第七战区参谋长兼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旋调回中央，于四川璧山任军训部次长，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奉派任训政时期立法委员，第一届国民大会时，俊膺选代表及立法院立法委员，辨任近30年。

王俊一生，深研现代战争大军统帅术，为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学者，与蒋方震（蒋百里）、杨杰齐名，时人称三大军事家。他以其聪明才智，渊博学识，献身于国民革命，创办步兵学校，以效力于抗日救国大业。著有《师长战场指挥之研究》等著作多种，以《步兵操典》最著名，曾于民国24年获颁国民政府之“绩学勋章”，对国家军事理论作出卓越贡献，为时人所称颂。

二

1930年冬，王俊奉命筹备南京陆军步兵学校，受委为中将筹备主任。其初，在南京城内周必由巷租赁民房数间，成立筹备处。时值“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家大难，时

南京国民政府统帅下的军队，有历经北伐战场的国民革命军，又有地方混什队伍，既无统一编制，又缺乏正规教育训练。此前虽已设立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但军事学术教育科目及训练方法等，均沿袭日本、德国、苏联等国家的制式，杂乱无章，各行其是；又因聘来的教官多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之故，仿日之风尤为显著。而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及教导总队，聘请的是德国顾问，则实施德式训练。因此，步校筹备开始，王俊即首先确定步校教育训练之主旨：第一是如何方能适合中国环境，使中国步兵学校具有与外国步兵学校不同之特质；第二是有良好而统一意志之师资，方能产生良好之学员以贡献于国家。故应甄别师资，教导师资，使其对管教上之意志完全统一；第三是力改中国新军教育一味模仿日、德、俄等外国什碎，而无本国统一之典范令以为标准的状况。中国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立于世界政治地位上之自由平等。中国军事教育训练上如不能脱离各国之羁绊，永为列国附庸，则中国自由平等之地位便永不能巩固。如何创编适合本国军事之典范令，尤其是国军主兵之步兵操典，以为军事教育训练上确立坚定不移之准则，诚为急不容缓之事。第四是战略战术上如何使步兵学校的教育内容具有独特重点。师以上之运用，当时已有陆军大学总其成矣，班排以下之基础教育，亦已有军官学校开其端点。然则步兵学校之教育如何才能屹立于两者之间而不重复不脱节，有待肇创。

1931年，步兵学校筹备处由周必由巷迁到南京城外卖糕桥附近之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旧址继续筹备。是年秋，因建筑校舍乏款，再由晓庄迁回南京，于挹江门附近三牌楼

之三十三标兵房积极进行工作，按预定计划甄选师资，编制教材，核正教案等，粗具基础，开始招收学员。1932年2月12日，第一期学员队90余人，在三十三标之步兵学校内正式开学。经核令每年2月12日为步兵学校校庆日。

建校开始，王俊就以创造适合本国国情之典范令为教育训练指挥作战一切之依据，作为步校第一件大事。他说：中国是大陆国家，步兵为军中之主兵。欲求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得到自由平等，必须先在军事上能有自由独立之能力；欲求军事上有自由独立之能力，必须先在军事教育上自己创造适合本国国情之典范令以为军队教育训练指挥作战一切之依据。典范令之于军队，犹如佛经之于佛教徒，四书五经之于儒生一样的重要。而典范令之创造编订，又必须从步兵方面着手。

王俊在起草步兵操典第一部说明中阐明：“步典纲领第一条是讲国军建立之目的：世界各国之建军，各依其国策之不同，而异其精神之旨趣。我国以实行三民主义，求得自由平等为目的而建军。则我国军应以保障三民主义顺利推行，领土主权之完整无缺为全军一致之天职。此种职责之所在，乃我国军之所独有，我绝不能含糊引用任何他国之建军目的擅为己有，尤如任何他国不肯引用我所有一样，盖步兵为军中之主兵，主兵立，其他可以依此俱立，此乃步兵学校天经地义之责任，为建国建军必须建立步兵学校之要义。”王俊这种思想，与孙中山先生为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大业必须建立一支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军，故而创建“黄埔军校”的思想，是一致的。

王俊针对当时国内军事教育极为复杂的情形，力主本

国自研自定操典。他说：“留学各國者，各帶其所學歸國，依樣試驗實施於各學校或部隊，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無形中使中國軍事教育變成東西洋各國古今教育之博覽會。教育訓練如此，編制裝備作戰指揮等亦莫不如此；步兵如此，其他各兵種兵科亦皆如此；軍隊如此，其他地方團隊及警察亦皆如此，紛紛擾擾，几乎忘却了中國為四千余年獨立文明自主自立之國家民族者。蓋上無道揆，所以下無法守也。”

遠在此之前數年，對軍事教育之重心，國民政府採用德國式訓練，以當時德國操典中之二五冊為依據。所謂二五冊者，即自稱為德國操典中之第二部與第五部合冊之簡稱。但實查真正德國原本之二五冊，其內容與在中國的顧問所稱之內容差別甚大，誤錯極多。其最顯明之點，乃顧問所稱文本中有：軍人行列正步時，雙手均固定附著於兩腿而不准搖動。此種姿態為世界各國軍人所未有者。有向德國顧問詢問“德國軍人是否如此”者，顧問答曰：“否”，再問其何以如此規定，答曰：“合乎中國之需要”。當時軍事教育之雜亂，可以概見。經王俊及步校研究委員研討之結果，都以為要創立中國自有之操典，應先從修正現行之德國式二五冊操典開始。因此經報主管部門核准在步兵學校內成立操典研究委員會，令教導總隊、軍官學校、步兵監督、德國顧問等組成，由王俊為召集人，進行辯論研究，以步兵學校練習隊之實兵演習而證明原用操典之是否允當。

步兵學校主持之操典研究委員會，經多年編纂而成之步兵操典，復經 1933 年至 1935 年廬山軍官訓練團戰術與

实兵指挥教育实施结果，都认为成绩良好，适合于中国之需要。因此，中国步兵操典第一部于1935年8月4日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实施。在八年抗战中全国军事学校教育部队训练，均以此部操典为依据，使中国军事教育有了独立统一之基础。当时军事学界认为这是王俊主持编订中国步兵操典草案的一大功绩。

王俊还另外编制了一种辅助步兵训练的步兵教育图解。这种教育挂图，简易明了，对步兵轻重武器分解说明，表示出步兵制式教练、战斗教练之队形变化与原则运用，实为教育训练实施时最有效的良好教材。

步兵学校创建特有之练习部队——练习队，以为教官研练教案及学员实兵指挥之用。此种练习部队之存在与运用，形成步兵学校所以异于陆军大学与军官学校的特点之一。这种练习队之学兵，是招募具有高小、初中程度的失业青年，经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成为较好的步兵操典示范标兵。笔者就是第一批被录取的学兵，以后被选送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期受训。这批学兵，后来成为步校扩编教导团的中坚干部。

王俊鉴于“九·一八”沈阳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战役诸情形，深知非对日本战争，中国不足以立国；非迅速加紧教育训练部队并提高其作战能力，不足以对日作战。因此在学校内除固有之一年期学员队外，复增加设立有重一班、重二、三、四、五、六班，及射击班，迫击炮班等短期训练班。所谓重某班者，即以步兵所用之重兵器，例如苏路通机关炮、阿里达炮、伯拉特炮等。每一种炮设一个班以教育之。但当时学校经费有限（每月2.5万元），教

育之人数亦有限。中国幅员之广，步兵部队之多，交通行动之难，学员入学与返部之不便，似此种种，如欲将全国部队教育完毕，不知要花费多少年月，而敌国日本不会等待我教育完成才来入侵。对此状况，王俊深知非改弦更张，不足以达成任务，因此报经核准始有游动教育班之创设。所谓游动教育班者，即以若干名教官、助教、学兵组成一班，携带必要之教案、器材等，亲赴各部队驻地，一面示范，一面教练。各游动教育班之教法完全一致，以期使全国部队于短期内能获得统一之训练与作战方法及技能。游动教育班之收效甚大，只可惜班数无多，实施亦稍迟耳。

步兵学校之正式校址，于1934年迁到南京汤山汤水镇侯家塘。1937年秋，因抗战已经开始，即迁到湖南湘潭。此时步兵部队新装备之各种重兵器，陆续由步兵学校组编成团，最盛时期，有51、52、53、54等团及许多教导总队。这些团队均先后参加抗战，贡献不少。在淞沪抗战时，步兵学校派出一个独立机关炮排，参加上海作战的张治中将军指挥的第五军，担任战地防空，后撤至龙潭火车站担任水泥厂防空任务，时笔者任该排中尉排长。至南京失陷前夕，曾撤至浦口火车站担任防空。随后撤到湖南湘潭归制。

1933—1937年期间，王俊在步兵学校曾担任庐山、峨嵋山、珞珈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办的军官训练团军事教育、图上战术及现地战术、战斗教练之总责。（笔者在庐山训练团时，任排连战斗教练助教）。“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他又负全国游动教育之责，在校内仍负全国步兵各种轻重新兵器训练装备之责，备极辛劳。

王俊初任步兵学校第一任校长，后蒋介石兼任各军事

学校校长，王俊改任教育长实际仍负总责。在职八年，造就军事干部众多，为抗战建军奠下一定基础。由步校出身之教员、学员、学兵不乏克尽厥职之人。对军事有所贡献者，例如第一期学员队毕业学员中，后去台湾者有曾任“福建省主席”之李良荣、“副参谋总长”罗有伦；在大陆者有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王启明，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第二期学员队毕业）等诸人。

王俊自步校筹备、开学，直至1938年秋步校迁到湖南湘潭时，才奉调离职，步校教育长由张卓升任。1940年步校本校（此时为教育方便起见，步校设有西北分校及西南分校，故有本校、分校之称）迁到贵州遵义，旋因张卓教育长奉调为第一军军长，遗缺由刘震清补充。抗战胜利后，刘震清他调，由周鸿恩与其他一二人接充。1948年国民政府南移广东，邢定陶充任教育长。随后步校迁往台湾。

三

抗战军兴，王俊调充军事委员会统帅部第一部副部长，仍兼步兵学校教育长，主管作战计划。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继徐州会战之后，武汉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日军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迫使政府屈服，以尽快结束战争。这时我国为了抵御民族大敌，与侵略者长期抗战，必要巩固武汉，以此为中心，坚持抗战。这就发生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武汉会战。它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中日双方在长江沿线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四省，长达数千

里。日军集结了 14 个师团，3 个独立旅团，1 个机械化兵团和 3 个航空兵团，加上海军舰艇 140 余艘，约 35 万兵力。我军相对列阵，动员部署了 14 个集团军、10 个军团和 2 个战区直属部队以及海空军一部，约 100 万兵力。这一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线之长，规模之大，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王俊此时肩负筹策保卫大武汉会战计划之重责，依据抗战形势，会集部内作战参谋人员，研究敌情，拟定保卫大武汉会战作战计划，提出在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对敌情判断、战军布置、指导方针与要领、战域划分及主官委派、临机机动之可能等均作出了精密分析与部署，其基本思想是：欲保武汉，必于武汉外围及鄂、豫、皖的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战斗，而不可只着眼于武汉三镇作瓮中焦土之斗。在全面战争原则下，所有地方之物力人力，以及全民之抗战精神，均应纳入抗战要素中（有关作战计划详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1938 年 4 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在武昌珞珈山开办军官训练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万耀煌任教育长。当时任大本营第一部副部长的王俊，被调任军官团军事组负责讲述抗战战略战术问题。为了适应抗战形势，该团还聘请中共人士周恩来（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主讲抗战形势，叶剑英讲游击战术，秦绍禹主讲国际形势。国民党中央委员汪精卫、孔祥熙、陈立夫、贺衷寒等和英、美、法等国顾问以及陆军大学、步兵学校、防空防毒学校的专业教官，也分别到训练团授课。王俊在步兵学校组织一批教官、助教及练习队，参加战斗教练演习示范。当时笔者率步校独立机关炮排从南京撤至武汉，任王

俊随从副官。对他为武汉大会战运筹划策，为抗战事业作出的贡献，为建军培养军队各级干部，费尽心血之情形，知之很多；对他学识渊博及待人宽厚之道德风范，感受至深。

四

1938年秋，王俊调离步兵学校，任广东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3年任第七战区参谋长仍兼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1938年10月下旬，日军陷武汉，继续南下，企图攻长沙、衡阳，打通粤汉路。长沙三次大会战胜利，予敌军以重创。日军1938年10月21日攻占广州后，多次北犯，受到我粤军强烈抵抗，无力仰攻粤北，在清远以南地区及广州外围与粤军相持，成胶着状态。在粤北重镇——韶关（曲江），第七战区司会长官余汉谋指挥下，只有第十二集团军3个军（62军黄涛、63军张瑞贵、65军黄国樑）9个师及二个独立旅，此时肩负战区参谋长兼集团军副总司令的王俊，指挥粤北良口战役，是役大捷，战功卓著。同时全力贯注全军的整顿和训练，在乐昌开办1个军官补训团，派林湛任教育长，其中教官、学员队长大部调用步兵学校教官助教担任，按步校训练方法及行之有效的教育训练方案，召训营长以下军官入学员队训练，3个月一期轮训全军干部。在韶关还举办将校班，召集军师校级以上军官分批前来受训，其旨在提高战斗精神与意志，检讨对日军作战经验教训，增进指挥战斗能力，增强敌忾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王俊总负其责，亲自讲解“空舍清野配合球状战术”（时笔者任第十二集团军总

部参谋处中校参谋，调来听讲）。这种战术，是他在抗日战争以来，精心研究对敌作战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心得，是把正规战术与游击战术相结合的整体战。这使粤军在战斗间隙的部队整训，取得极大效果。

五

1943年王俊调任军训部次长，部长为白崇禧。时值抗战后期，国土大部沦陷。日军乘我长沙第三次会战失败之机，直趋衡阳，乘势西进陷桂林，继转而孤军深入黔境，窜抵独山，无力再进，被迫后退。侵占缅甸的日军，入侵滇西，其快速部队窜至怒江西岸，被我军阻击，退守松山。同时轴心国的德国，在欧非亦节节失败。同盟国英美议定开辟中国战场，蒋介石成为中国战场最高统帅。我国派出远征军2个军入缅与英军共同对日军作战。以后我军在印度重新装备，受美式训练；国民党军大部接受美械装备，实施美式军事训练。在抗战大反攻前夕，王俊任军训部次长期间，辅助部长对军队教育训练，视察部队，致力整训，亦有所贡献。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王俊奉派参加何应钦为首的受降工作中国战区划分为15个受降区。（受降地区划分，详见《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王俊在处理日军投降繁重的工作中，辛劳备至。

六

抗日战争胜利，王俊膺选为立法委员，曾提议将海南